

历史档案中的近代云南瘟疫防控(上)

□ 杨祝庆

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一些地方自古就被称为“瘴病之区”,疟疾、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常年流行,有些疾病甚至造成全省大爆发,对人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严重

伤害,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全省瘟疫防控形势长期严峻。根据昆明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可知,近代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在与瘟疫展开的长期斗争中,积累起一些宝贵的防治经验,也有不

少深刻惨痛的教训。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所有的防控瘟疫斗争,经验和教训总是相辅相成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探索中,逐步提高防控瘟疫的水平和能力。

长年累月 瘟疫肆虐

近代云南,传染病疫情在全省的总体流行水平居高不下。民国初期,云南各县尚未建立疫情上报制度,具体疫情数据难以准确掌握。直到1938年8月,云南省民政府将疫情月报分发各县卫生专员,令仿按月上报,才开始定期统计并上报疫情。当时,规定应填报的传染病为霍乱等9种。因云南疟疾疫情长期严重,又增加疟疾和恶性疟疾,共应填报11种。

从历史档案中可知,云南各种疫情肆虐之时,全省无一地方幸免。以1944年7月中旬为例,云南全省各地报告感染伤寒117例,死亡11例;感染赤痢389例,死亡9例;天花3例,死亡1例;斑疹伤寒68例,死

亡2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9例,死亡3例;回归热100例,死亡5例;猩红热5例,死亡2例;疟疾1007例,死亡4例。

仅是这份1944年7月的月报数据,就可看出疟疾和赤痢患者遍布全省各县。各县报告疟疾患者少则1-2例,多为10-20例,最多为保山县116例,其他依次为曲靖县55例、元江县52例、峨山县31例、永胜县28例、思茅县25例。赤痢感染地区比较严重的是曲靖县68例、永胜县3例、峨山县17例、保山县16例(数据来源:昆明市档案馆,档号:30-7-4)。其他原因造成的贫病死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云南省会昆明是全省医疗卫生

条件最好的地区,但在1944-1948年,每到夏季,昆明也是疫情肆虐,尤其回归热、疟疾、伤寒、斑疹伤寒、赤痢感染严重。

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源于美国的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它如洪水猛兽般席卷全球,致使约10亿人感染(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约17亿人),造成5000万至1亿人死亡。这次大流感也波及云南,据《云南卫生志》记载:1918年“大理县发生流行性感冒,一月内死亡4千人”。

从疫情月报档案看,1938-1949年,云南每年都有规模、程度不同的瘟疫流行,各种瘟疫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因病施策 分类应对

近代云南在防控瘟疫的斗争中,既有综合性、通用性较强的措施,也根据各种传染病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

设立专门机构,防堵结合。1948年夏,保山县施甸坝鼠疫流行,流传至下关。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紧急派员调查,指导扑灭工作。为防患于未然,昆明市政府立即成立预防鼠疫委员会,市政府拨款专款用于防疫。10月,昆明碧鸡关检疫站成立,任命龚克昌为主任,带队对滇西入昆人员、行李、货物和车辆进行消毒,对人昆人员注射预防针剂,同时对其他普通疾病进行免费救治。

沿线设卡,严格检疫。根据档案资料可知,云南在外省入滇和省内入昆的重要通道设立检疫站,对霍乱、鼠疫等传染病进行检疫和预防注射。由当地警察局协助检疫工作。据昆明市档案馆防疫档案记载,1943年8月2日,贵州独山和都匀两县发现霍乱。贵州省卫生处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滇黔绥靖公署。滇黔绥靖公署发出训令,指令检疫站沿线设卡,严防扩散,警察、民政等有关部门协助检查,加强防范,并特别要求滇黔公路沿线的警察局,协助进行检疫。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接到训令后,转令曲靖检疫站和昆明东站检疫站,检查过往行人和车辆。8月19日,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处长缪安成,致函云南省会警察局,请求“转飭所属,惠予协助”。云南省会警察局接到训令和公函后,分别转令曲靖警察局和昆明东站警察局分局,派警员协助检疫站进行检疫。

以隔离为主的麻风病、鼠疫对策。1921年,在昆明郊区建立云南第一座省级麻风病医院——昆明麻风病院,作为集中隔离和收管麻风病人的医

院。麻风病院隶属于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由该处所辖的昆明卫生事务所直接管理,患者口粮则由昆明市政府养济院按月供给。麻风病院建院20多年后,因养济院本身口粮有限,而救济支出日增,致使供麻风病人的口粮,初则延期,继则归于停顿。到1942年9月,因经费不足,口粮不敷,患者为饥饿所迫,偷逃出院,沿街乞讨。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临时调剂部分经费,但难以继。有关部门相互扯皮,一拖再拖。1943年2月,病人又出逃乞讨,引起滇黔绥靖公署注意。

昆明市档案馆馆藏防疫档案记载,1943年2月4日,滇黔绥靖公署查辑大队报告,其四巡巡查队员发现,近日有狗咬田麻风病院,因生活费高昂,该院所发口粮不敷,竟任意将病人约50人完全放出,病人沿街乞讨。为预防疫情扩散,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接到报告后,随即发出训令:“因麻风病传染最烈,自应认真远隔”,要求云南省会警察局“严加取缔,转飭约束,以后不得再有麻风病人发现市区,以免传染”,口粮则由省财政厅拨付。另外,严令主管单位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认真收管,勿再放任”。根据训令要求,各警察局和麻风病院协作行动,及时查获麻风病人送回医院隔离收管,避免了疫病传染。

1949年8月29日,昆明市立医院报告,在本院内发现状似鼠疫患者,向昆明市政府建议,在郊外隔离病人。昆明市政府报请云南省政府同意,决定在碧鸡关检疫站增设隔离室,以备收容患者使用。

以清洁、消毒和打预防针为主的伤寒病对策。根据档案记载:1948年5月2日,昆明市警察局卫生科发出防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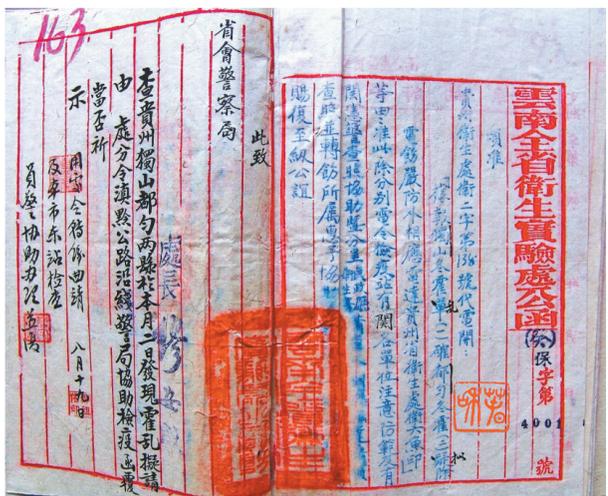
训令称:“本市五月五日疫情报表,列有本分局警士海渭泉系患伤寒。查此症为急性传染病,多系由饮食及平时不注意清洁而感染,死亡率亦高。兹拟具预防此病要点,令仰各分局转飭所属,切实办理。”为维护警员健康,训令指示各分局采取消毒措施,注意个人卫生。这份训令后面附有《夏令卫生须知》,全文如下:

- 1、防止传染病,随时注意清洁。
- 2、不喝生水,食物餐具须用遮盖。
- 3、勿吃生水做的食物或腐败食物。
- 4、勿吃露生剖开瓜果及生冷食品。
- 5、住室应随时用滴滴涕喷射。
- 6、厕所粪便应随时清除,并用石灰石或漂白粉消毒。
- 7、快打霍乱伤寒预防针。
- 8、凡发现传染病患者,应作通知,隔离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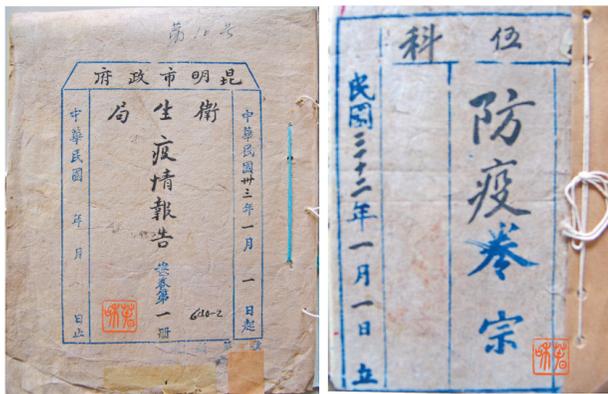
以消毒处理为主的回归热对策。用DDT(滴滴涕)进行消毒处理。在上述昆明市警察局卫生科训令中指示:昆明“羊市口仁本堆店有回归热患者,多为虫虱而传染。由该分局速派员前往,督飭该堆店用滴滴涕消毒,以杜传染为要”,这里说的“堆店”是当时经营仓储、货运和客栈的旅店、马店,人员流动性大、密集度高,容易集中传染各种疾病。

从1948年12月1日至15日的《昆明市碧鸡关检疫站工作旬报》,可见当时消毒工作之一斑:12月上旬,碧鸡关检疫站用于车辆和货物的消毒剂滴滴涕油液共18桶;预防注射三次,第一次注射287人,第二次注射46人,第三次注射9人;客商货物行李消毒342人次,约190吨货物、470件行李;车辆消毒客车4辆、货车32辆,军用、公用卡车和吉普车38辆;义务免费治疗其他病患17人。

(作者单位: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1943年8月19日云南全省卫生实验处处长缪安成就防范霍乱致省会警察局的公函



1944年1月昆明市政府卫生局疫情报告封面 1943年1月1日云南省会警察局防疫卷宗



1943年2月4日滇黔公署收管麻风病人的训令(首页、次页)

药说云南

解毒名药升麻的历史沉浮

升麻是一种在我国古代被人们广泛认可和反复记载,并用来命名产地县名的“南中药”,也可以说是“云南第一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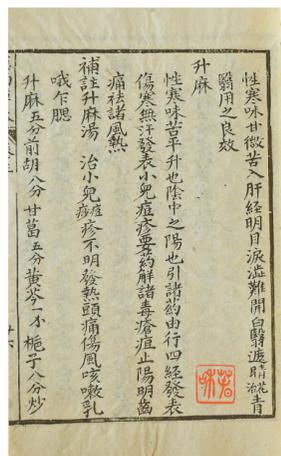
□ 苏国宥

升麻,是一种具有升举透发、清热解暑等神奇功效,较早就为人们所认识的药物。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称其“味甘,平。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瘴邪、毒蛊。久服不天。”成书于东汉末至西晋间的《别录》曰:升麻“一名周麻。生益州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日干”。

升麻是一种在我国古代被人们广泛认可和反复记载,并用来命名产地县名的“南中药”,也可以说是“云南第一药”。“生益州山谷”的升麻,早在西汉以前就名声远扬,以致西汉王朝一开始在云南设置郡县,就用这种药物来为一个县命名。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离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金印,复长其民。”西汉王朝设置的益州郡(驻今晋宁晋城晋城),下辖滇池等24县。其中,“收麻”为今寻甸、嵩明。《汉书·地理志》“收麻”下注:“麻音麻,即升麻,杀毒药所出也。”东汉至唐朝,“收麻”县名先后改称“牧麻”“牧麻”“升麻”。《晋书·地理志》“牧麻”案:“牧麻与牧麻、收麻,皆以形近而讹。”

这个以药物“升麻”命名的县名,从汉至唐存在了874年,直至南诏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在今嵩明设长城郡,升麻县才停止使用。

一个县因药得名,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西汉以后,县因药得名,药因县扬名,升麻和升麻县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



务本《滇南本草》对升麻的记载



升麻图(原载《滇南本草》整理本第二卷)

度。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升麻县,山出好升麻。”百年之后,北魏郦道元《水经·若水注》云:“涂水(今称车洪江,下游为牛栏江)出建宁郡之牧麻南山。”并注:牧麻“山,山即即草之牧麻南山。”山在昆东北乌山南五百里。立生牧麻,可以解毒”。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称:“百卉方盛,鸟多误食,鸟啄中毒,必急飞往牧麻山,啄牧麻以解。”从诸多史籍记载可知,这种连鸟误食中

毒,都要急急忙忙飞往牧麻山“啄牧麻(升麻)”解毒的药,一直是一种知名度极高的药物。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种药物,当人们获得关于它的新知识时,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加速了它的采收和应用,也就有可能加速了它的消亡。南朝医学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草木上品”云:升麻“旧出宁州者第一,纤细而黑,极坚实,顷无复有。今唯出益州,好者细削,皮青

绿色,谓之鸡骨升麻。北部间亦有,形又虚大,黄色。建平间亦有,形大味薄,不堪用”。这里的“宁州”,是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设置的直隶于晋王朝中央的一级政区,治滇池县(今晋宁区晋城镇)。太康三年(282年)废,太安二年(303年)复置。南朝宋移治味县(今曲靖市),齐移治同乐县(今陆良县西),梁复移治味县。北周改为宁州。“益州”,镇成都。“建平”,南齐改建宁郡(治味县)置,移治同乐(今陆良县西),梁大宝后废。

在陶弘景生活的时代,旧时包含牧麻(今寻甸、嵩明)县在内的宁州所出产的升麻,品质最好,为其他地方出产的升麻所不及。但可能是挖采过度等原因,“宁州名药”升麻已“顷无复有”。

隋唐以后,随宁州升麻的消失,因药得名的升麻县也名声暗落。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政权统治下的云南与内地的交流减少,云南的药物自然也难以流传到中原。没有了宁州升麻这味好药可用的唐宋王朝,也就十分注重开发利用其他地方所产的升麻。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于1082年编成的《政和证类本草》云:“《图经》:升麻生益州山谷,今蜀汉、陝西、淮南州郡皆有之,以蜀川者为胜。”《图经》,指北宋宰相、药物学家苏颂所著的《本草图经》。可见,北宋时期,蜀升麻的名声已盖过了滇升麻。至明代,川升麻更是名声鹊起。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李恒等撰《袖珍方》中以管窺豹。《袖珍方》是周王朱榘滇滇,命良医正李恒等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初撰于云南的。在这部易于携带、“妙选”药方的医书中,以升麻为主药的方剂,有治伤寒的升麻葛根汤和柴胡升麻汤、阳毒升麻汤,治五痹的升麻汤,治五疳内所因证的玄参升麻汤和升麻散,治口舌的升麻散,治牙齿疼的升麻散,治胎前众疾的升麻散和升麻六合汤,治疹豆的升麻葛根汤共11方。这些来自8部医书的方剂之中,治伤寒的和治疹豆的两个升麻葛根汤,都明确要用“川升麻”,却没有任何一个药方指明要用曾名噪百年的“滇升麻”。

敝帚自珍。不管其他地方的人不重视滇升麻,明代滇人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还是将升麻作为一种重要药物,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清代务本《滇南本草》既把升麻“升也,阴中之阳也”,能够“引诸药游行四经”,为“发表伤寒无汗,发表小儿痘疹要药”等特点,又在“治小兒痘,痧疹不明”“咽喉疼痛,咳嗽音哑,肺热等症”方面拓展了升麻的用途,老药新用,让老树开出新花,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云南升麻是一种具有良好品质的药物。在万德光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一书中,专家通过对出产于四川、辽宁的8种升麻与云南升麻进行测定,发现云南升麻的咖啡酸、总有机酸含量,都比其他8种升麻中的最高值还高出许多。这也就是说,道地的滇升麻确实具有某些优异品质,是一种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和重塑品牌的名药。(作者单位:昆明市政府)

文史资料

保护华茶和支援抗战——普洱茶的十五个重要历史发展节点(五)

□ 蒋文中

第十四个节点:保护华茶,扩大生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以茶叶作为侵略手段,对西藏进行经济入侵并挤压华茶,云南茶业参与保护华茶之战,成为普洱茶历史发展第十四个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英法列强垂涎于普洱茶的巨大销量和高额利润,对普洱茶利益进行种种劫掠,并通过茶叶对西藏进行经济渗透活动。

云南紧邻西藏,滇茶以“浓、强、鲜”的特点著称于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备受藏区人民青睐,具有很大市场。一直企图分裂西藏的英帝国主义早就对普洱茶利益垂涎三尺,通过其东印度公司大规模组织印度茶倾销西藏,其目的方面是争夺茶利,另一方面是借机达到分裂中国领土、掠夺中国经济之目的。正如历史学家万国瑜教授指出:英帝国主义曾经从印度侵略中国西藏,妄图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

早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和《中英印藏条约》的签订,英国便在中印口岸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的边茶贸易,而且对四川、云南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导致华茶特别是川滇茶在西藏销量锐减,白银以及藏区土特产品大量外流,遭到西藏僧俗各界及川滇爱国民众的抵制和反对。

为抵制英印茶,保卫中国茶包括藏族人民热爱的普洱茶,云南各界掀起爱国行动,先后成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云南省思普企业局、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今凤庆)、实验茶厂、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宜良茶厂。另外,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下关康康茶厂(今下关茶厂)等。上述机构加大制造藏销紧茶等,如当时昆明复兴茶厂主要任务是用勐库和凤山茶为原料,加工名牌“复兴”沱茶销往西藏。下关茶厂则直接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和康康商人代表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订约,共同出资15万元,专门生产销往西藏的大众紧茶等。勐海茶厂同样主要生产紧茶销往西藏。当时勐海很多爱国人士积极投入保卫华茶的行动,如李佛一先生大力收购和加工紧茶,通过马帮商号销售到西藏各地,并设法出口缅甸、印度。

滇、川、藏爱国民众为保卫中国茶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中国茶业的地位,还进一步提高了普洱茶的品质,并揭开了近现代普洱茶生产走向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盛大篇章。

第十五个节点:出口创汇,支援抗战

1937年至1945年全民族抗战时期,茶马古道一度成为中国南方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普洱茶业出口创汇、支援抗战并得到新的发展,这是普洱茶历史发展的第十五个重要节点。

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军的封锁和滇缅公路阻断,茶马古道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茶叶贸易的增加进一步催生了从六大茶山、普洱、临沧、巍山、下关到大理、喜洲、鹤庆、丽江、中甸、德钦的大量商帮,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商业集镇及交通网络的崛起。一时间,国内外商贸云集,有北京帮、四川帮、青海帮和云南帮上百家大商号进驻拉萨。云南丽江、鹤庆、喜洲、德钦、腾冲等地商帮,在拉萨设立商号40多家,其中丽江商号就有20多家,且大都在八角街附近繁华地段。西藏的各个边境口岸和周边国家的商业城市,都有中国人开的商号,云南李达三的“达记”在加尔各答有分号,在这些商贸重地,都有迪庆、丽江、鹤庆的马帮前来接洽。

193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范和钧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石城,带领90多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茶叶技术人员,来到热带雨林深处的西双版纳勐海,勘察茶山,引进设备,创建茶厂,出口茶叶赚外汇来支持抗战。范和钧先生在《创办佛海茶厂的回忆》中写道:“佛海是藏销紧茶的重要产地,紧茶是藏胞一日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销藏紧茶每年为数可观。紧茶制作后,俟季节性马帮到来,便可装驮起运。先到缅甸景栋、茵已,转火车到仰光,搭轮船到印度加尔各答,转运至中国西藏边境成交。”

抗战时期茶马古道上的商业运输,与“驼峰”航线空运相配合,对中国的抗战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



下关同庆茶庄注册的下关沱茶景象商标